



新史学

梁启超 著
夏晓虹 陆胤 校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夏晓虹 主编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夏晓虹主编

新史学

——梁启超著
夏晓虹 陆胤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ISBN 978-7-100-09765-9

I. ①新… II. ①梁… ②夏… ③陆…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765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

新史学

梁启超 著

夏晓虹 陆胤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65-9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插页 2

定价: 32.00元

中國史叙論

第一節 史之界說

任公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紀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

法國名士波留氏。嘗著俄國通志。其言曰。俄羅斯。無歷史。非無歷史也。蓋其歷史。非國民自作之歷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動者而他動者也。其主動力所發。或自外。或自上。或自異國。或自本國。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內部之漲生。宛如鏡光雲影。空過於人民之頭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是俄國與西歐諸國所以異也。云云。今吾中國之前史。正坐此患。吾當講此史時。不勝慚憤者在於是。吾當著此史時。無限困難者在於是。德國哲學家埃猛培濟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爲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羣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畧論之。

第一、正史 (甲) 官書 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乙) 別史 如華嶠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志。元秘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第二、編年 資治通鑑等是也。

第三、紀事本末 (甲) 通體 如通鑑紀事本末。繹史等是也。
(乙) 別體 如平定某某方畧。三案始末等是也。

第四、政書 (甲) 通體 如通典文獻通考等是也。
(乙) 別體 如唐開元禮。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是也。
(丙) 小紀 如漢官儀等是也。

第五、雜史 (甲) 綜記 如國語。戰國策等是也。
(乙) 瑣記 如世說新語。唐代叢書。明季神史等是也。
(丙) 詔令奏議 四庫另列一門。其實雜史耳。

史學

飲冰室文集類編下 歷史

二百九十三

1904年《飲冰室文集類編》所載《新史學·中國之
旧史學》，改題《中國史界革命案》

學 · 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 一 總論
- 二 胚胎時代
- 三 全盛時代
- 四 儒學統一時代
- 五 老學時代
- 六 佛學時代
- 七 儒佛混合時代
- 八 衰落時代
- 九 復興時代
- 十 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 十一 地理上之關係上
- (國內地理)
- 十二 地理上之關係下(國外地理)
- 十三 政治上之關係
- 十四 文學上之關係
- 十五 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 十六 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觀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為最廣。印

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極難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

異殊。其數則一也。此事為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章之。

总序

夏晓虹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存在。他对清末民初那代人的深刻影响，早经身历者不断叙说；即使时至今日，其著作征引率之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名列前茅。

以治学而言，梁启超的兴趣广博，涉猎门类极多，后人因此称之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不过，在诸般学问中，其最钟情者显然是史学。晚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学，时为学生、后亦成著名学者的姚名达向导师请教：“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梁启超毫不犹豫地答道：“史也，史也！”（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这无疑是以金针度人。

从前期的投身政治活动，到后期的倾力讲学著述，梁启超无论是以政论家还是学者的身份撰著，其史学底蕴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探究中国富强之道，梁启超即将命题转换为《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从救国方略考量，居日期间，梁氏不免特重社会科学，尤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多用功夫。问题意识虽集注于当下，论题却可以从上古说起。于是，要论证专制政体有害于中国，便写下《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欲将中国改造成成为法治国，“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也必要先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及其姊妹篇《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为谋

求币制改革，“以促政府及国民之警醒”，故撰《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甚至完成一篇《中国古代币材考》，亦自辩并非“玩物丧志”，而“归结于今日中国之必当用金以为主币”。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其借镜实在西方。并无多少外语优势的梁氏，介绍起西方学说，也照样力图从头说起，著作中因此留下《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改题《论希腊古代学术》）、《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格致学沿革考略》等未竟之篇，在在透显出作者的史学癖好。

而这种以现实政治为标的的历史考察，即使在学术论著中也时有流露。1902年发表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被胡适推许为“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四十自述·在上海（一）》）。此篇原与《新民说》一同在《新民丛报》刊出，对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的清理，于是也和“新民”之道发生关联。“新学术”既可以作为“新民”利器，篇中对思想自由的向往与对学术专制的抨击亦与其政论相呼应，构成了这部学术史的主线。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梁启超在此时期提出的“新史学”观。梁氏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而旧史学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其无法达成上述目标。梁启超因此大声呼唤“史界革命”，并身体力行，对旧史学进行了犀利的清算。而这些“在当时真能言人所不敢言”的批判，“虽相隔三十几年”，仍然让其清华国学院高足、历史学家杨鸿烈在写作《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时，“觉得非常的‘淋漓痛快’”（第三章《史学的“今”与“昔”》）。“新史学”明确主张为国民著史，为今人著史，以研究历史进化规律为职志。由此而引发的学术思潮，也在中国史学界经久不息地回荡。

推究“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实在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即史学自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从1902年撰写的《新史学》所下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学之界说》);到1922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历史学的重新界定:“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一以贯之的正是科学精神。而对纷纭的历史表象背后复杂的文化成因的探求,始终是梁启超史学研究的动力。这种努力,用梁氏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总结的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即所谓“求得真事实”(《总论》第一章《史的目的》)来概括,亦精要传神。

科学精神又不只体现在对史学终极目的的探求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已然论及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即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即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文章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实际上,“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史学之界说》),也正是梁启超在史学界努力开拓的新局面。1901年写作的《中国史叙论》总共八节,其中便有一节谈“地势”,一节谈“人种”,实乃“新史学”观的提前预演。梁启超不满足于传统考据学的琐碎,借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与技术手段,期望获致的是一种宏观、深邃的视野。尽管这些学科间的互融不乏日本学界先在的诱导,但毫无疑问,梁启超对此始终满怀兴致。早年热衷于人文地理学,作《中国地理大势论》;晚年又将统计学引入史学研究,成《历史统计学》。其不断出新的探索,开史学研究众多法门,也给后来者以无穷启示。而梁氏毕生治史的经验,部分留存在两本《中国历史研

宪法》中,让一代代后人汲引不尽。

不过,历史科学对于梁启超来说,从来不是单纯的学问,而必定有致用的诉求。早年欲著《中国通史》,意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三十自述》);晚年不断讨论“史之意义”与“史的目的”,最后均落实到“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史的目的》)。除去在社会活动方面具有鉴往知来的意义,梁启超的特别之处在于,重视读史对个人人格修养的陶铸之功。这在1920年代的史学著述中表现尤其明显。既然“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国学研究又被区划为“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两类(《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指点古代典籍的阅读门径时,便往往兼具“为修养受用”与“为学术的研究”二重目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更是特意添加上“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的别样标题,以凸显该书在人生哲学方面的特别用心。其间固然有早年熟读朱王学说留下的印迹,但1920年欧游归来后,发愿以中国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念想也不容忽视。

以梁启超的眼光、气魄,独立修撰一部《中国通史》,乃是其念念不忘、也有望成功的一桩志业。从1901年起意,到1925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文化史”,其间,梁氏几次试笔书写,并将通史的计划扩展成为文化史,却均因各种缘故而最终放弃。这自然是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而其存留至今的两份1920年代所拟目录,《中国通史》计分三部三十三篇,《中国文化史》拟分二十五篇,格局阔大,却又巨细靡遗,章目之间,尽显现代史学精神。即使面对这些残页,也足以令人惊讶、钦佩任公先生纵横各学科之博学无涯。

相比于两部大史的完成篇目无多,清点梁启超的史学著述,最

成系统与规模者当属学术史。从最初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后来的《中国学术史》（包括《中国佛学史》、《清代学术概论》）、《国学小史》（初名《中国学术小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诸作，梁启超涵括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与清学五部的《中国学术史》，大致成稿近半。这笔丰厚的遗产，当年曾嘉惠无数学子，今日仍不失为值得反复研读的学术经典。

有这样骄人的史学业绩，梁启超生前的自期，“假如我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已完全应验。而最新统计中，《饮冰室合集》在近十年历史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中排名第一（见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足以让我们体悟，梁启超的史学影响不仅未尝消减，反而历久弥深。

反观此前出版的各种梁启超史学著作，尚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未保持初版样貌，取消或改变了原有标点，或者在版本选择与校勘方面多有不足。为此，实有必要进行重新整理。

今次拟精选梁启超重要史著若干种重行整编。其工作原则，一是尽可能恢复梁启超的最初构想，将在《饮冰室合集》中分散的篇目加以归整，如使用上列《中国学术史》与《国学小史》的命名，而合并原先独立的成书（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等）与散落的论文；二是尽可能选择最早或最完整的版本（包括手稿与报刊）作底本，同时以其他有价值的版本参校，并注明各版异同；三是尽可能保留原作者的标点和用字习惯。目的是提供一套精良的梁启超史学著作读本，以方便学界使用和一般读者阅读。

2013年10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导读一：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

——关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夏晓虹 1

导读二：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 …… 陆胤 21

校订说明 …… 60

中国史叙论 …… 63

第一节 史之界说 …… 65

第二节 中国史之范围 …… 67

第三节 中国史之命名 …… 68

第四节 地势 …… 69

第五节 人种 …… 72

第六节 纪年 …… 75

第七节 有史以前之时代 …… 77

第八节 时代之区分 …… 80

新史学 …… 83

中国之旧史学 …… 85

史学之界说 …… 92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98
论正统	107
论书法	115
论纪年	120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25
第一章 总论	127
第二章 胚胎时代	131
第三章 全盛时代	139
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	139
第二节 论诸家之派别	143
第三节 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阙)	159
第四节 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	160
第四章 儒学统一时代	171
第一节 其原因	172
第二节 其历史	174
第三节 其派别	178
第四节 其结果	186
第五章 老学时代	192
第六章 佛学时代	199
第一节 发端	199
第二节 佛学渐次发达之历史	200
第三节 诸宗略记	202
第四节 中国佛学之特色及其伟人	210

第七章 (阙)	216
第八章 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	217
第一节 永历康熙间	217
第二节 乾嘉间	235
第三节 最近世	240
中国地理大势论	253
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	夏晓虹 279

导读一：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

——关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夏晓虹

一

1902年2月，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3月起，《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①，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

据《新民丛报章程》^②标示，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因此，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也成为其时梁启

^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前六章，初时陆续发表在1902年3—12月的《新民丛报》第3—5、7、9、12、16、18、21—22各号上；1904年，梁启超又续写出《近世之学术》部分，刊于同年9—12月《新民丛报》第53—55、58号。

^② 《本報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释，为延续到“五四”以后的改造国民性话题开了先声。与此同时，在其他栏目出现的梁文，无论所谈为历史或现实、政治或文学，其着眼点也均在“新民”之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自不例外。

“百日维新”的失败，证明日本“明治维新”由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变革方式在中国不能照搬；1900年唐才常等在国内组织“自立军起义”失利，又使改良派“武力勤王”的计划破产。经此一系列重大打击，梁启超沉潜思索，转而以启发民智、鼓吹舆论为救亡图存、改革中国社会的入手处，“新民”理论于是应运而生。

《新民说》的出发点，一则曰：“国也者积民而成。”一则曰：“‘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①也即是说，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础，在于培植一代兼取中外优长的国民。因此，梁启超在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也秉持此义。

那段时间，梁启超一再引用宋代理学家程颐为文乃“玩物丧志”的说法，即使是讨论学术问题，也有意与“于国民之进步无当也”的“今所谓涉猎新学、研究西书者”^②相区别。而其所期待的“读书致用”，即在“新民”。依梁启超之见：“新之有道，必自学始。”这也是梁氏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而得出的结论：

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

① 分见《新民说》之“叙论”与“释新民之义”，《新民丛报》第1号。

② 中国之新民：《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丛报》第1号。

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①

而在《新民说》中“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节^②里，我们也可以读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话，可见，梁启超是把“新学术”（与“新民”一样，此“新”字也作动词解）作为“新民”的利器，而列为当务之急。

刊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前，梁启超先在《新民丛报》第1号发表了一篇《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以为张目。文中所举证之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斯密、达尔文等，无一不出自西方，而其学说对于世界文明史均产生过巨大影响。篇末，梁氏寄语中国学者，谓其“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而这希望的落实，便在假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撰著，总结中国固有学术思想之得失，以西方文化参补之，从而恢复上古与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③。

为此，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时，便刻意突出了反对思想一统而主张学术自由的主线。篇中称“春秋末及战国”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全盛时代”，推尊其“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而追溯所以致盛的原因，虽列举七端，“思想言论之自由”为其中一因，但实际除了“由于蕴蓄之宏富也”与历史传

① 中国之新民：《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号。

② 《新民丛报》第1号。

③ 见第一章“总论”，本书第128页。